

坐上慢車緩緩行

姚文冬



自由談

一個朋友要去遠遊了，已經買好機票，我不以為然，如同過年不放鞭炮、不燉肉、不在除夕夜吃餃子就沒有年味，坐飛機也使旅行味道寡淡。過年屬於閒適的慢生活，旅行也是蹦蹦跳跳的事，飛機太快，太快的生活就缺鹽少味。旅行是一種漂泊，坐飛機是在天上飄，旅味也被風吹散了，少了腳踏實地、慢慢悠悠的漂泊感。

雖然一個電話，二三十秒，寥寥數語，就能完成拜年的全過程，可我仍願意走在落滿鞭炮紙屑的大街上，穿胡同、過小巷，朝聖般奔向長輩的籬笆院，一步一揚塵，輕輕推門入戶，給老人家問一聲過年好，再磕上一個響頭。惟其如此，才有儀式感，這是我心中亘古不變的拜年方式。

旅行也要有儀式感，火車就具備這種儀式感，尤其是慢車，站站停、緩緩行，彷彿進入無窮無盡的假日，拓展了空間，也拉長了時間，心情也隨之寬曠、舒緩、悠遠。

記得以前去天津，那咣咣、慢騰騰的綠皮火車，使天津變得遙遠。唯其遙遠，更覺神聖。那時去一趟天津，要住下來，白天逛勸業場，晚上在海河邊散步，夜裏躺在賓館床上數羊——有離鄉遠的愜意。一天不能往返，要坐第二天的車才能回家。回家後，要調整好幾天，那旅味才漸漸散去。

現在，把去天津稱作旅行會被人譏笑。自從有了高鐵，千里江陵一日還。春節後送兒子回天津，目送他進了唐山站，我才開車回家。新華道上車流量大，等紅燈時，不知該做些什麼，想到該給兒子打個電話，問是否順利上車了。兒子回答：「已經到天津了。」令我驚愕不已——遠行的人居然比家門口徘徊的人更先抵達。此時，新華道上車流擁堵，憤怒的喇叭不絕於耳，恰似「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高鐵就這樣無情地抹去了我對一個城市多年的神秘感。早春去江南，更加深了這種感受。高鐵簡直就是滬寧線上的公交，從南京到上海一線，五六分鐘一趟，一二十分鐘一個城市，比在同一個城市裏坐公交還要便捷。但是，坐在高鐵上，我懷疑自己變成了一個商人，彷彿在和時間賽跑，去搶奪一次商機。抵達過於容易，令人遊興銳減，儘管江南美景如故。

所以我還是喜歡坐慢車。在喧囂的硬座車廂，裝著滿滿的人，五湖四海，形形色色，吃喝拉撒，笑語喧嘩，是個流動的人間。年輕時坐幾十個小時是家常便飯，餓了，腦袋往後一仰，打個盹

，可能幾十分鐘，也可能幾個小時，隨睡隨醒，耳邊回響著南腔北調、婦孺嬰啼；間或有列車員推醒你，查你的票，或讓你抬起腿來，他要掃地；售貨員像身懷絕技的雜技演員，穿梭在狹窄的過道和腿架間，推著長條鐵皮貨車叫賣瓜子飲料礦泉水，不急不躁、從容淡定；睡不着，就扭頭看窗外，異地風景，無論多麼平常，都是新奇的；也有開心和對座的陌生人聊天，來自何處，去向何方，同時笑笑他的口音。置身這樣的人間，甚至感覺目的地的風景已不重要。

坐慢車才會邂逅一些陌生小站。小站只停留一兩分鐘，下去三五個人，又上來兩三個人。那些人，要麼是走親戚的，要麼是游子還鄉，來去匆匆、疲憊不堪。他們沒有心思享受慢車的悠閒，嘴上埋怨太慢，心裏卻感激它的廉價，又照顧了他們——只有慢車才會在小地方設這麼一個站點，不然，他們回家的路會更周折。這些小站，還能給你帶來別樣的詩意。去年，從山東南行入院，剛過陽谷縣，又過鄆城縣，彷彿是穿行在《水滸》裏，這樣一想，就覺得還有更有意思的事——我此行的終點安徽亳州，那是曹操的故鄉，便覺得走出了《水滸》，又將進入《三國》，如此慢慢地享受著「改朝換代」，飛機和高鐵都是做不到的，那只是從一個樓群闖入另一股人流。

許多年前，坐無錫開往蘇州的慢車，途經一個叫新安的小站，那是個灰暗的小站，朋友說，她有個女同學嫁到了這裏，這個小鎮很窮，話語間有淡淡的憂慮。於是，這個小鎮的名字便在我心裏駐足了整整二十年。今年乘高鐵經過，很想再看到這個小站，想著時過境遷，小站的背後，早應是富庶的江南了。高鐵卻如一道閃電，從無錫到蘇州，一閃而過，沒讓我尋到半點小鎮的痕跡。更覺得高鐵就如步履匆匆的現代生活，省略了許多本該珍愛的細節。

旅行是一種生活，生活更似一場旅行，那些令人回味和感動的細節都滋生在慢中。可我知道，慢車會越來越少，一些令人迷戀的瑣碎生活將不復存在，猶如書信的消失，那份漫長的等待，等待中如煲湯般嫻嫻來遲的美味，那越等越濃的期盼，已經被手下輕巧迅捷的短信、微信所替代，一兩秒的瞬間，就完成了交流。還有誰會在街頭痴痴地等郵差呢？那叮鈴的單車，那綠色的身影，會帶給我們多少朝思暮想的喜悅。

只怕有一天慢車會消失，遠方越來越近，月亮觸手可及，那神秘而詩意的遠古物象，終將成為眼前一塊冰涼醜陋的石頭。所以我固執地拒絕著快，努力把腳步放慢，坐上慢車緩緩行，慢些，再慢些，讓人生的旅程長些、再長些。



飲食男女

也可以這樣說，蝦糠是一種美食，因為蝦糠鮮，那時的蝦糠和現在的蝦糠不能同日而語，過去還沒有人工繁殖這些事，對蝦、各種海蝦是從大海裏撈撈的，原生態，對蝦、海蝦去頭去尾，取之為蝦仁，邊角料的蝦頭蝦尾蝦殼，曬乾，搗碎，就是蝦糠。上好的蝦糠，看起來黃橙橙的，聞起來鮮味撲鼻，抓一把鬆渣渣的。

那時的蝦仁、蝦米是珍貴之物，內地一般家庭消費不起，蝦糠看起來不太物美，但是價廉，一般老百姓家庭花上點錢，買來斤把二斤蝦糠，以備不時之用。

蝦糠吃起來也很簡單，上學、上班、出外等，帶上點蝦糠，餓了，或就餐時，掏出一張煎餅，捲上蝦糠大蔥，有滋有味地大快朵頤，既能填飽肚子，也不失為一種美食。我在縣城讀高中時，星期天下午返校，母親

蝦糠

王誦詩

為我準備了一包煎餅，附加一小罐頭瓶的隨蝦醬，如果家裏蝦醬缺了，母親就包一小包蝦糠給我帶着，還有一小捆大蔥，或一些大蒜。到學校，煎餅捲大蔥蝦糠，或煎餅捲大蒜蝦糠，吃得肚子鼓鼓的。同學們互相交換「美食」，蝦糠也忝列其中，同學們也很喜歡吃蝦糠的。

來了親戚，蝦糠也能上桌。大姑來我家走親戚，家裏沒有準備什麼菜，也沒有什麼菜可準備的，雞蛋是現成的，韭菜炒雞蛋，炒土豆絲，又切了一個老鹹菜，怎不能就三個菜吧，母親又抓了一把蝦糠，放在碟子裏，湊成四個菜，四四（事事）如意。吃過中飯，大姑和母親拉呱，其間去了幾趟廁所，回來後，趴在母親耳朵上，紅着臉小聲地說：「不知怎的，我肚子不好。」母親立刻意識到，這可能是蝦糠作的「怪」，蝦糠可能變壞了，也可能裏面無意摻了一些不好的東西，害得大姑拉肚子，實在不好意思，母親趕緊找出一隻鴨蛋，煮熟了，又向鄰居家找

來一點白糖，叫大姑用熱鴨蛋蘸着白糖吃，過了一會，大姑拉肚子居然好了。

現在海邊養殖對蝦的池塘到處都是，一到秋天，對蝦出塘，有的冷凍加工廠收購大量的對蝦，僱用一些小工，扒出蝦仁，一盒盒裝好上冷庫冰凍，冷凍蝦仁是珍貴的，過些日子，看準時機，或出口，或銷往外地，賣個好價錢。剩下的蝦頭蝦尾蝦殼曬乾了，加工成蝦糠，賣給養殖戶，有的餵魚蝦泥鯽，有的餵雞鴨鵝鵪鶉，有的餵生豬藍狐水貂，蝦糠裏含有豐富的鈣質和多種維生素，增加這些養殖對象的營養，不失為一種好飼料。

現在餐桌上看不到蝦糠了，平常小菜，蝦糠也早已退居二線了，蝦仁，蝦，也是很平常的，賓館飯店，家庭餐桌，經常吃到，如果誰要是吃蝦糠，就會被笑話為「二百五」（傻瓜），不過我想，不時嘗點蝦糠，品味一下過去的鮮味，當一回「二百五」，也未嘗不可。

當勞動節遇上「插秧節」

嚴輝文



往事鉤沉

又到五一勞動節。回想過去，直到上世紀末，老家拆遷前，我的五一勞動節基本上就是「插秧節」。想着父母要不違農時插秧，哪裏還敢起過節休息旅遊的念頭？

關於插秧，最早的記憶是農村家庭聯產承包前。我小時候，還是大集體時代，聰明的農人已經發明了「計件法」。在我的記憶裏，這種更好地體現勞動效率與勞動報酬的「計件法」，首先應該是從插秧開始的。

插秧如何避免吃大鍋飯呢？灣裏人先把各類水田整出來，然後分包給各家各戶去搶插，比如插一畝田，計十分工。我們家基本「家情」是人口多而工分少，算是一個老超支戶。

記得每年臘月，灣裏的那個結帳日，都是父親甚至於全家最不開心的日子。父親要算出每家盈虧情況。收入的當場得錢，超支戶要向灣裏交超支款。在我們成長的那些年裏，最殘酷的事情莫過於主持結算的父親要算出我們家，必須還村集體多少超支款。

超支呢，父母心裏不好受，只有在計件插秧時，帶領全家往死裏掙計件工分。父親起五更睡半夜扯秧加挑秧，母親帶着我們兄妹四個每天插秧幾乎長達十數個小時。

天公造美的日子也不多，常常是插早秧時，風雨如晦，天氣突變。四月底的清晨，水田裏能把兩條腿浸得像冰棍一樣。媽說，做起活來就熟了，凍不死人的。

插秧這種活計，作為一種勞動，對人的體力、耐力都是一個極大的考驗，雖然健力士大全不屑考慮這個，近些年國人鼓搗這個節節節，也基本上遺忘了傳統農耕社會這種對體能和忍耐力極限式考驗的勞動。

為了解決人類的溫飽問題，漢民族至少貢獻了插秧這個偉大的勞動範例。偉大的背後無疑也是折磨和痛苦的超值勞役。

插秧的動作要領其實很簡單，而能否堅持通常十餘天的苦役型勞作，又能否高效率，則人與人之間有巨大的差別。你站在水田裏，只需要簡單地重複下腰、插秧、移動後退，再下腰、插秧、移步後退的動作就成了。說起來簡單，能否把這些動作有機整合起來，尤其是能否像科學設計的機械一樣，減去冗餘的動作，實現插秧效益的最大化，效果又大不一樣。一般說來，被譽為插秧機的插秧冠軍會挑戰單人每天一點五畝的極限線，而這個榮耀通常非十六到三十六歲之間的女性莫屬。

野無閒田 村無閒人

插秧時節是農村全民總動員的時節，也是養不起閒人的時節。哪怕是農村的懶漢，也是難逃一劫的。更何況以糧為綱的時代，正所謂野無閒田，村無閒人。閒人與閒田的存在，都是一種罪過。

插秧時節，對我這個最害怕最想逃避又不得不在水田裏浸泡的人來說，更是一種終極考驗。看到我們要哭不得嘴扁的樣子，母親首先曉之以理：誰叫我們是超支戶呢？不掙點工分哪有錢讀書呢？然後動之以情：插了秧買新衣服，農閒了帶你去漢口。

站在水田裏，就覺得苦日子長得就像灣裏最長的水田。直起腰來，看到滿田滿畝裏都是默默勞作的人，而躬下腰，從褲襠裏往後望，水田比學校的跑道還漫長，簡直沒有信心熬到頭。熬到受不了時，我不時起田喝水、小便、消滅腿上吸滿血的螞蟥，不時又藉口回家做飯、燒茶，不時裝肚子痛（有時不知是裝痛還是真痛），乾脆利落地躺倒在田埂上睡覺，彷彿田埂是世界上最好的床。

正如世界上所有行業都有「行規」一樣，插秧計件的「行規」是這樣的，在一塊整好了的田裏，哪家先扔了一把秧，那塊田就由哪家搶插了。常常一塊田還沒有插到一半，父親就依「行規」揪空到另外一塊空田裏扔了秧。本來十餘天插下來，人成爲了農田和稻秧的奴隸，成爲季節

的奴隸，成爲了工分的奴隸，成爲了糧食的奴隸。腰腿都麻木了，手指頭都泡腫脹變形了，腿上被螞蟥叮了無數次，最後整個人幾乎都異化了。最後父親往灣裏人都厭棄的低窪田裏扔秧時，我們兄妹四人都哭了。

把這種能陷死牛的沼澤改爲出產糧食的水田，是農業學大業的結果。一陷進那泥潭，人和牛都直往下沉，根本不知道到底有多深？最後這種人牛俱畏的田，通常屬於我們這種超支戶。熬到插秧季的最後，我們全家陷在沼澤田裏，都好像只有半截身子的人一樣在泥面上移動，好不容易插了一排秧，又得拚命往外拔腿後退。沼澤裏彷彿有一股魔力，你越是想快點拔出腿來，越是拔不出來，得把腿子慢慢搖，在泥水裏搖出空隙來，才能拔出退後移。這哪裏是插秧，是挨命啊！

我向母親抱怨，是誰發明插秧的，把穀種撒在田裏不行麼？沒想到母親對插秧史還真有研究。她說：從前的人都是撒秧的，後來有些地方撒密了，有些地方撒稀了，有些地方乾脆沒有長苗，有聰明人發現把撒密的時期的秧扯起來補插在稀的地方照樣能長成稻穀。更聰明的人發現重新插的秧比撒的秧長勢更好、產量更高，插秧就此取代了撒秧。我又問，那這沼澤田爲什麼不能撒秧？母親說，兒啊，能撒秧，灣裏早撒了，我們還哪裏去掙工分呢？聽著母親的開導，我們一邊在沼澤田裏淚如雨下，一邊把稻秧直直地栽到沼澤裏。

人類歷史在時代的風煙中沉澱，歷史教科書意味著歷史的簡單化，況且這個世界上大約沒有誰會有興趣去弄一本《中國插秧史》的，更不會有人去書寫插秧這種水稻種植最初工序中所蘊含的血淚和苦難、憂傷與榮光。所有這一切，都讓人想起家鄉曾經最流行的口頭禪：田難種、人難做、屎難吃。這種艱難，沒有經歷過傳統農業社會的淬火打磨的人，尤其是被新技術新工具新制度所嬌慣的現代城市人，殊難想像。

蔡元培母親教子慎言

陸琴華



人與事

我國著名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蔡元培二十二歲那一年，也就是一八九〇年春天，到北京參加科舉考試。當時他的試卷上有「耳也者心之鐸，躬之督也，及順鐸道張督權而已矣」之類的話，意思是說耳所聞身所觸無他，只不過是一番親自體驗感悟而已。有人認為蔡元培的這種說法無厘頭，可能屬於無稽之談，就問當時的座師孫毓山：「督躬有來頭嗎？」誰知孫毓山連考慮都不考慮就脫口而出：「這何必有來頭。」很快北京坊間流傳出「聞面居然登榜眼，督躬何必有來頭」的一副對子。對子談諧幽默，對座師的心不在焉予以諷刺，這也從另外一個方面可以看出蔡元培出語時可能有不慎重之嫌。病從口入，禍從口出，俗語也有手老實嘴老實處處安身的說法。故此，蔡元培母親周氏很早就開始對蔡元培進行慎言教育。

「我母親是精明而又慈愛的，我所受的母教比父教多，因為父親去世時，我年紀還小。」這是蔡元培《傳略》裏的一段話。身教勝於言教，說真的，周氏不識多少字，可是非常注重言傳身教。周氏要求蔡元培慎言，做事兢兢業業，一絲不苟，自己呢？也是這樣。家裏要是來了什麼親友，需要她去接待，接待前，總要反覆思考了那親友話該如何說。親友問話，自己又該如何去應對，前前後後，盡量不出現差錯。這種做法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綽綽有餘，如果親友離開了，周氏還會靜下心來一個人好好回想一下她跟親友的見面和接觸，看看其間彼此對話是否按照事先綽綽有餘的去說的，就跟牛反芻似地總結得失。周氏自從跟蔡元培父親蔡元普組建家庭以來，先後生育七個子女，除了長子蔡元銓和三子蔡元堅，以及蔡

元培長大成人外，其他幾個，比如蔡元培的兩個姐姐在二十歲以前因病先後離世，四弟和幼妹未成年也相繼夭折。缺乏父愛的三個小兄弟難免會有一些齷齪，比如表裏不一言不由衷，朝令夕改見異思遷等，母親周氏發現了都要嚴厲批評。據資料可知，蔡元培從十七歲以後，不再受到一些塾師的束縛放膽讀書，比如《說文通訓定聲》、《章氏遺書》、《日知錄》、《困學紀聞》、《湖海詩傳》等，這些書讓蔡元培大開眼界，不僅僅把對子和八股文做得像模像樣，而且散文和駢文也做得相當有水準了，這就博得一些文友的好感和青睞。文友紛至沓來，一起跟蔡元培看書談天。蔡元培喜上眉梢，一激動，誇誇其談，就相約一些文友分頭來編什麼大部頭的書籍，比如《廿四史索引》、《經籍纂詁補正》等。這些計劃都是由蔡元培提出或建議的，可是三分鐘熱度一過，幾個月後又丟到一邊，另起爐灶了。這種言行不一、朝三暮四、虎頭蛇尾、不能持之以恆的做法很令一些文友的不屑，當時有一個徐姓文友總結蔡元培說：「無事不貪，無事不偏。」蔡周氏知道了，非常生氣，不僅在給蔡元培理髮時批評蔡元培，還在一起吃飯的時候指出蔡元培的缺點。母親說：「如不改正，必將鞭笞。」母親慈祥，可是生氣起來也蠻嚇人的，記得蔡元培有一次因為屢誠不改，周氏就在蔡元培早上還沒有起床時，「掀開被頭，用一束竹篾打股臀等處」，一邊打一邊罵蔡元培的各種過失，直到蔡元培「服罪認改」為止。

「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歟，君子人也。」在母親周氏的慎言教育下，蔡元培後來出任民國首任教育總長以及北大校長，其間的傑出表現足以證明蔡元培是「近代融合乎君子的標準的一個人」。



吳南地北

薩爾茨堡不僅是音樂天才莫扎特的出生地，也是現代著名指揮家赫伯特·馮·卡拉揚（Herbert von Karajan）的故鄉，薩爾茨堡老城在一九九六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每年夏天都會舉行薩爾茨堡音樂節。音樂節期間全世界的傑出音樂家蜂擁而至，城市的山谷、河邊到處都盪漾著樂聲。

站在薩爾茨堡河邊眺望古城和山上的城堡，蒼翠的大自然中，兩岸黃白相間的建築散發著遙遠中世紀的氣息。一九六五年荷里活在那裏拍攝了電影《仙樂飄飄處處聞》（The Sound of Music），從此一個薩爾茨堡修女瑪利亞·馮·崔普的故事傳遍世界。二戰時，這位修女憑藉著自己的歌聲，帶領一群孩子巧妙擺脫德國納粹，翻山越嶺逃離被佔領的奧地利。我們乘車經過的教堂、湖泊和豪宅裏到處都留下了當年拍攝的足跡。

走出薩爾茨堡，一路上山巒忽遠忽近，奧地利的鄉間是美麗的，沿途是大片翠綠的田野，深色的民居點綴在綠色的田野和茂盛的綠樹叢中，這些民居顯然是農民居住的，面積頗大，外形典雅。這樣的鄉村景色在中國內地沒有見過，美國西部的鄉村色彩和線

莫扎特故鄉那些事

葉周

條也沒有那麼豐富，那種感覺恍如眼前滑過的是一幅幅色彩瑰麗的歐洲古典油畫。

剛說古典，路上又偏偏閃出一座現代感極強的玻璃建築，門前立著一群抽象感十足的奔騰的牛群藝術造型。原來那是世界著名

的運動飲品品牌紅牛的總部。紅牛公司的總部與生產線設址於奧地利的湖濱福熙（Fuschl am See），是個距離薩爾茨堡不遠、人口一千三百多人的小鎮。

（三）



薩爾茨堡老城山上的中世紀城堡

作者供圖